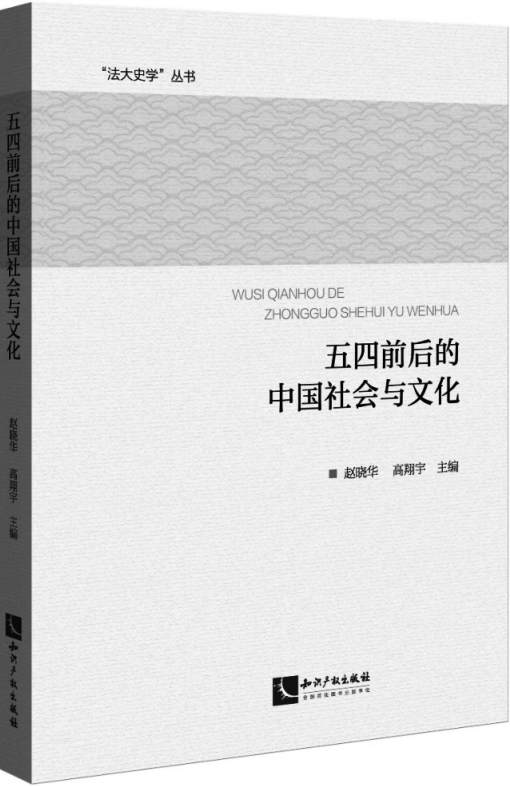


新书馆

重读“五四” 返回众声喧哗的历史现场

——评《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张格乐

忧国忧民、热爱祖国、积极创新、探索科学的五四精神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华诞之际，回溯“五四”之社会、“五四”之文化、“五四”之思想，建构“五四”经验与中国道路生成之间的历史逻辑，既可补充历史教科书宏观叙事的空白地带，又有助于连接一幅幅五四前后风云激荡的中国社会现状与文化风貌。

由赵晓华、高翔宇主编的《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一书于2021年3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录多所高校学者的22篇论文，涵盖历史学、文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多角度呈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之趋势。本书为读者提供了22块“五四”历史风景之拼图，既可补充历史教科书宏观叙事的空白地带，又有助于连接一幅幅五四前后风云激荡的中国社会现状与文化风貌。

思想史维度呈现“五四”图景

本书立足学术前沿问题，或聚焦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或从党史党建的视角观照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之培育，或探究民族主义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内在源流，或择取五四时期代表性的文艺作品，重释作家作品的思想张力，或从灾荒史、妇女史等专题研究领域切近历史现场，呈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变迁与政治转型之联动。

民族主义议题上，刘丹伟集中探讨在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初期，“中华民族”的思想认同如何形成的历史进路：从传统的“华夷之辨”到民国肇建之际的“五族共和”，再到“中华民族”概念的广泛

阅读提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华诞之际，回溯“五四”之社会、“五四”之文化、“五四”之思想，建构“五四”经验与中国道路生成之间的历史逻辑，意义深远。《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一书收录多所高校学者的22篇论文，为读者提供了22块“五四”历史风景之拼图，既可补充历史教科书宏观叙事的空白地带，又有助于连接一幅幅五四前后风云激荡的中国社会现状与文化风貌。

提出，各族同胞作为一个具有共同认同感的民族得以确认与维系，民族凝聚力空前加强，这为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铸就了牢固的情感纽带与精神共同体。

思想文化议题上，郑云艳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古书难读”的两种归因，间接呈现了背后对立的新旧思想，并指出时人针对“古书难读”所提出之解决方法。通过这种富有逻辑而不失生动的讨论，五四时期新文学与旧思想场域中互相博弈的历史脉络愈发清晰，抽象化的文化变革也在具体问题的论战中逐步形象化。

从文本解读观社会思潮

侧重以文本作为研究资料，解读文本自身或他人对文本的评述，进而呈现五四时期思潮界翻涌之势，是本书的另一特点。

郭丽萍在《想象国家：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剖析》一文中，以144位左翼知识分子对“梦想的中国”之畅想为例，挖掘何为民国知识人的“中国梦”。在国家定位问题上，他们基本达成“反帝”共识，希望构建一个“大同世界”。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阔步行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为世界谋大同”既是百年来知识界畅想的“中国梦”，同时也是每一位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向往的“桃花源”。

李长莉通过引述俞平伯、林语堂、潘光旦对《浮生六记》的解读，探讨五四新知识分子在家庭观念上的分歧，发覆扶微几近湮没于时代洪流的传统文本，在文化价值重构与话语体系变革的背景下，展现出启蒙主义、科学主义、西方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冲击与碰撞。

张娟以鲁迅的《伤逝》作为分析对象，审思五四新人在时代转型期所遭遇的迷茫与困顿，以及为突破瓶颈贡献的历史智慧与历史方案。由此可见，论著对于文本的选择与研究跨越古今中外，兼及通俗文学与学术作品。

发现被遮蔽的女性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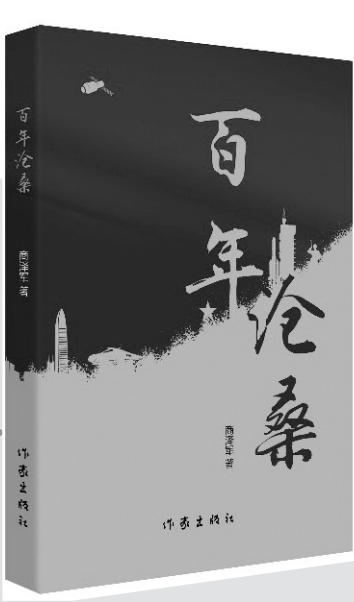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奋斗目标。但在“人民”这一抽象的概念下，不同群体在社会现实中面临着各具迥异的困境，因此欲从根本上解决不同阶级以及同一阶级内部之问题，需要着重考察他们各自的生存状态与革命诉求。尤显特色的是，本书对于“五四”前后的工人阶级、知识女性等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

阅读提示

《伟大纪念日》

吴海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21年7月版

本书是一部关于七一建党纪念日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作者以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7月1日为线索，从1936年共产国际首次策划庆祝中共成立15周年为起始，用文学性的语言讲述了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战等诸多大事件，直至1938年7月延安举办“纪念中共十七周年”的大型活动，梳理了毛泽东提出七一建党纪念日的历史脉络，塑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初心、使命担当、接续奋斗，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光辉形象，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致胜的精神伟力、中华民族赖以复兴的核心动力。



《百年沧桑》

商泽军 著
作家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以诗歌的方式重走百年历程。”本诗集分为初心、热土、浴火、人民、担当、梦想、旗帜七卷，作者跟随先辈足迹，走访了多地革命历史遗迹，见先人所见，念先人之心，有感于先烈的牺牲、今人的奉献与奋斗，以及祖国日益强盛，用激昂的文字记录下自己激荡的心情，用赞歌向建党百年献礼。《壮美生命起始的地方》《照亮中国》《醒着的眼睛》《中国的脊梁》……作品感情真挚，简朴的文字缅怀光辉的历史，字里行间氤氲着对国家民族的自豪与热爱——“一提这个名字就使我们热泪盈眶”。

《“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

[日]石川祢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本书前部分从1937年日本政府公报登载的一幅错误的“毛泽东”照片入手，追寻外界逐渐认识中国革命领袖的历史过程，以及其间所发生的误解、巧合与蓄意隐瞒。后半部分则致力于复原《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过程与版本流变，详细梳理了它在中国、苏联、日本等地的历史命运，澄清了后世对于这一名著的诸多误解与不实指控。



(言浅 整理)

从古至今，无论东西方文明，女性和植物之间的缘分都难以一言以蔽之。加拿大学者安·希黛儿的代表作《花神的女儿》是一本试图梳理18世纪60年代之后的百年间，欧洲女性与植物学之间互相牵绊的女性主义科技史著作。该书并非撰写植物研究的英雄史诗，而是关注到在历史的隐蔽角落中，女性对科学和自然知识的贡献。

张馨予

近年来，“森系”时尚潮流席卷全球。“森系”风格最开始源于日本，意为“穿着如同在森林中”，而今已经发展为一种生活态度，强调返璞归真、拥抱自然。崇尚该潮流的女性则被称为“森女”。继“森系”之后，“植物系女生”一词又悄然流行，最开始被用来形容那些个头矮小，只能呼吸别人的二氧化碳的女性，后来不断有人将一些特点加诸在“植物系女生”之上，包括恬静柔和、温柔善良等。这其中的逻辑实难分明，但无论从“森女”还是“植物系女孩”，都可以看出一种将女性与植物紧密纠缠的倾向。可以说，从古至今，无论东西方文明，女性和植物之间的缘分都难以一言以蔽之。致力于女性与性别史研究的加拿大学者安·希黛儿的代表作《花神的女儿》(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便是一本试图梳理18世纪60年代之后的百年间，欧洲女性与植物学之间互相牵绊的女性主义科技史著作。

分类，丈量万物的尺度

现代社会从何处开端？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建立对自然万物统一的分类标准和体系，应当是现代社会的相当显著的特点。看似简单的分类法背后体现的是人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对自然万物归类，便是用某种分类方法背后的观念来认识、丈量与评价自然万物。

18世纪，卡尔·林奈基于花部的繁殖器官建立了植物人工分类系统，植物学因此得以迅速流行。但其分类方法能被普罗大众广泛接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贴合了当时的性别政治正确。安·希黛儿评价林奈，“对植物性关系的描述充满想象，大肆渲染18世纪的性政治。”林奈对植物王国进行了人格化描述，将植物比作新郎、新娘。由此，植物的繁殖系统也可以与人直接进行比较。

林奈的植物分类及命名法十分贴合传统性别观念，将代表男性器官的雄蕊作为高一级的“纲”，而将代表女性器官的雌蕊作为次一级的“目”，借由纲目的分类，将当时的性别意识形态自然化。花语书便是这时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不同花有着不同的意涵，男性通过送花传达对女性的欣赏，衡量爱的程度，可以说，林奈系统所引发的植物学大流行，用“自然”的名义反过来加强了“masculine”与“feminine”的社会性别建构。

女性与男性，休闲与科学

“姆姆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又命催花使者，往来保护，以期含苞吐萼之时，加之呈妍”……我们恐怕很难想起比用植物来比拟一名女性的成长更令人觉得恰如其分的话语。

无独有偶，18世纪80年代以后的欧洲大陆有着与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似的想象。植物学与传统观念里女性天性和“本职”角色相一致，植物美丽、优雅且娇弱，女性温顺、柔和且依赖男性。一时之间，从夏洛特皇后到不得不以植物写作来谋生的夏洛特·史密斯，仿佛所有的女性都在学习植物分类、命名与绘画，植物学成为社会中上层培养女孩女性气质最流行的方式之一。不过在此过程中，对植物繁殖器官的大量露骨描写和拉丁语的命名法带来的争议与难题一直伴随着林奈分类系统的普及与推广。但也正是这两种争议将对植物的研究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向着植物生理学发展，而另一部分则存活于后花园内，成为女性的消遣娱乐，这些献身于植物研究的女性被限制在家庭和朋友之间，只能向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发展方向。

同时，追求科学知识、阅读大量书籍在18世纪也是独属于男性的特权，像伯里克利对雅典女性们教导的那样，“珍惜你们本能的谦虚，把不成为公众谈论的对象，看作最高的荣誉”。对18世纪那些在植物学上颇有认识的女性来说，要学会在各种公共场合，甚至是写作之中“藏拙”，用温顺的语言、巧妙的话术掩盖自己的学识，以避免被贴上卖弄学问、男人气、不宜结婚、无慈母心的标签。

柔韧的植物，妥协的女性

随着植物学的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觉植物世界里还有更值得深入挖掘的科学知识。而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植物爱好者中女性占比居多。于是在植物学界，一场针对女性的“清扫”开始了。

从前，植物学作为游离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特殊类别，女性得以利用被认可的母职与教育者角色之间的统一性而在其中促成成功。而今，新的、更理性、科学化的植物学兴起，林奈的时代即将终结，男性革命者们要“拯救”被“肤浅知识”“女性技能”所捆绑的无辜的植物学，女性逐渐被剥夺在植物学领域的话语权。

但这场“清扫”运动获得成功了吗？在作者笔下，我们仍看到那些热爱植物的女性以科学家女儿、妻子甚至是研究赞助者的身份出现在植物研究的大军中。安妮·普拉特、玛丽·柯比、莉迪亚·贝克尔，这些女性用自己的勤奋、智慧和谦卑，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新的植物学领域中，仍旧开拓出许多不可忽视的成就。她们像生长在岩缝隙隙中的绿色，咬定青山不放松。也因此，有人评价《花神的女儿》是一本游离于植物学史研究边缘的著作，因为它并非在撰写植物研究的英雄史诗，而是关注到在历史的隐蔽角落中，女性对科学和自然知识的贡献。

那么“清扫”失败了吗？这也是该作品更独到之处，安·希黛儿没有忽略在这场革命中女性做出的妥协，她们在植物学写作中采用更严谨的科学用词，去除作品中的诗意、亲切或所谓的“女性气质”。但我们不能否认，男女终究不同，在这样一种完全以男性模式来建构的科学世界中，女性是否能够争取到真正的平等？《花神的女儿》没有给出答案，但它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想象之路，或许科学也可以用女性模式来建构，那样的科学是什么样的面貌我们难以知晓，不过尝试去翻阅18、19世纪中那些女性作家的植物学著作，或许我们能够从中窥其门径。

《花神的女儿》：梳理女性与植物学的纷繁往事

